

# 韩国国史研究和教科书所阐述的东亚

赵珖（首尔市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高丽大学名誉教授）

## 序言

当前包括中日韩在内，东亚国家围绕着历史的争端比任何时期都要尖锐，伴随着这一现象，各国对本国历史教育的争议也越发激烈，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尽管东亚历史矛盾主要源自于中日两国历史教科书的本民族中心主义及国家主义倾向，但韩国也并非毫无干系。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带有单个国家历史观点<sup>1</sup>，下面就根据近期编纂并在学校普遍使用的教科书以及学界对日本关系史、中国关系史的阐述来看一下韩国历史教科书的倾向。

### 一、对前近代中国的叙述

就我们而言，“中国”是一个代名词，代指曾出现在现代中国领土上的所有国家。现有观点将多次经历兴衰的中国历代王朝历史均归结为中国史，认为前近代时期东亚的霸主国家都建立在这片土地之上。然而，与“中国中心论”观点最背道而驰的就是高句丽史部分。教科书中记述道：“高句丽是东北亚的霸主，占领了满洲和朝鲜半岛，国土辽阔，形成了一个政治制度完备的大帝国，与中国平起平坐，国力不相上下。”此处所说的东亚是否将中国排除在外？所谓“与中国平起平坐”指的又是中国哪个朝代？这段历史中的诸多疑点使人接受了新罗与强大的唐朝联手灭掉高句丽的说法。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隋唐两朝不灭高句丽便无以称霸，于是反复挑起战争，最终导致高句丽灭亡。

这种历史认识是基于某种“华夷意识”，这一点在对北方民族的叙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相关叙述认为，契丹和女真从高丽时期开始掳掠成习，用银子换取农具和粮食。似乎他们只是蛮夷而已，我们可以对其肆意征服和侵略。

在朝鲜时代与明朝的关系中，可以再次看到“吸收先进文化的文化外交”这一叙述。对于北方民族女真，则采用了所谓的“怀柔与讨伐的交邻政策”。对于清朝的叙述如下：“女真族曾向朝鲜进贡，朝鲜也认为女真族是蛮夷。与女真族建立的国家建立君臣关系，屈辱地臣服，这给朝鲜人带来了巨大冲击。之后为了雪耻，同时为了对壬辰倭乱时出兵帮助朝鲜的明朝克尽忠义，朝鲜发起了北伐运动，意在向清报仇”，“与清朝建立了形式上的事大关系”。对于清朝的发展则叙述为：“清朝提倡并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接受西方文化，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蛮夷女真所建的清朝结合了汉族文化和西方文明，成为一个文明国度，但是朝鲜却只和清朝维持了形式上的事大关系。尽管清朝成功地吸收了汉族的传统并适应了近代的西方文明，但终究摆脱不了蛮夷本质。<sup>2</sup>

### 二、对前近代日本的叙述

对于前近代中国的叙述中常常会出现“中国”这一代名词，但是却极少使用“日本”的说法，大部分是以“倭”、“倭寇”指称。直到7世纪后期，“倭国”才变成了“日本”。但是教科书中的叙述认为，百济“进入”日本九州地区，弃韩向倭出口铁，百济复兴运动中倭国水军曾援助百济复兴军。倭和日本的区分非常模糊。阐述传到日本的韩国文化时一直只使用日本这一国名，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表述，比如“三国文化传到日本，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形

<sup>1</sup> 以上摘自高英津，《韩国史教科书中的前近代日本》，《历史文化研究》第25辑，2006年。

<sup>2</sup> 金正仁，《东亚的重构——以高中〈国史〉与〈韩国近现代史〉教科书为中心》，《韩国社会教科教育学会学术大会志》，2008年。

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到了高丽时期，不再使用“日本”的说法，只使用“倭寇”。倭寇没有具体定义，只是叙述了倭寇侵略高丽的历史，书中对于日本中央政权并无叙述。

朝鲜时期与日本的关系也始于“倭寇”。书中提到，由于倭寇不断掠夺，朝鲜征服了对马岛。在日本的立场来看，“对马岛征伐”（又称“己亥东征”）就是侵略。这暴露出了韩国的双重标准，日本是侵略，韩国则是讨伐和进入。当然，壬辰倭乱和日本的殖民主义侵略程度无法相提并论。教科书中接着记述道：“对马岛征伐之后，朝鲜应倭寇的要求开放了三浦，即乃而浦、釜山浦和盐浦。”<sup>3</sup>

所谓壬辰倭乱（又称万历朝鲜战争）是指朝鲜和明朝联军在朝鲜土地上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这是三个国家共同的历史。现代韩国学界认为，壬辰倭乱是抵御日本侵略并获得胜利的民族斗争史，被视为“经验的历史”，是倍受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研究壬辰倭乱<sup>4</sup>似乎是一种时代要求，通过这种情感治疗来抚慰日本侵略带来的创伤。对外扩张时期，日本把对壬辰倭乱当作使侵略战争正当化的手段，韩国则通过研究壬辰倭乱来减轻殖民统治留下的创伤。

针对义兵活动和李舜臣海战的研究主题所占比重最高，这一研究倾向持续至今。而且这些研究都有着相同的观点，认为在政府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借助于地方两班、百姓及其李舜臣等英雄的力量，最终朝鲜才得以在战争中获胜。虽然在历史上他们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种“政府无能→日本侵略→英雄引领胜利”的结构却未必正确。虽然也有研究超越了个别主题，从通史的观点研究壬辰倭乱，但与上述结构并无大异。

柳成龙的《惩毖录》等朝鲜时代的史书对壬辰倭乱的一贯评价如下：“由于长期以来政治问题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朝鲜朝廷无法抵抗侵略，甚至弃都城而逃，最终依靠义兵和战斗英雄的力量才取得战争胜利。”但是，单看这一部分，二战结束前日本方面的研究也采用了类似的叙述方式<sup>5</sup>。尽管这些研究是为了满足不同时代的要求，目的也不尽相同，但从结果来看，在战争的叙述方面最终采都了类似方式。

部分学者指出了这种观点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sup>6</sup>，但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从胜与败、善与恶、先进与落后的角度研究韩国壬辰战争史的观点。

一方面，韩日两国壬辰战争研究史中出现的传统倾向基本都没有注意到讲和交涉。即使

<sup>3</sup> 金正仁，《东亚的重构——以高中〈国史〉与〈韩国近现代史〉教科书为中心》，《韩国社会教科教育学会学术大会志》，2008年。

<sup>4</sup> 崔永禧，《壬辰义兵的性质》，《史学研究》第8辑，1960年。

相佰，《第2编第6章 倭乱和对外关系》，《（震檀学会）韩国史》近世前期篇，乙酉文化史，1962年。

崔永禧，《壬辰倭乱》，世宗大王纪念事业会，1974年。

金锡禧，《壬辰倭乱中讲和交涉小考》，《文理大学学报》第9辑，釜山大学文理科大学，1966年。

炯锡，《壬辰战乱史》上·下，壬辰战乱刊行委员会，1967年（炯锡，《壬辰战乱史》上·下，新现实社，1974等修订增补）。

铉淙、崔永禧，《外族的侵寇 1. 十六世纪后期东亚局势，2. 日本的侵寇》，《韩国史 12 朝鲜两班社会的矛盾和对外抗争》，国史编纂委员会，1977年。

崔永禧、宋正炫、赵远来、孙宗成、章熙、张学根，《壬辰倭乱》，《韩国史 29 朝鲜中期的外来侵略及其应对》，国史编纂委员会，1995。

<sup>5</sup> 《两朝平壤录》、《惩毖录》、《武备志》等文献均认为，面对日本侵略，战争初期朝鲜惨败是由于政治混乱、缺乏战前准备所造成的。接触到这些文献之后著述的日本文献也接受了这种观点。（金时德《关于近代日本对外战争文献群》、《日本壬辰倭乱相关文献题解》，月亮图书出版社，2010年。（金时德《异国征伐战记世界：朝鲜半岛、琉球列岛、虾夷地》，笠间书院，2010概括。）这一逻辑被19世纪后期以后日本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背景下创作的诸多著述所沿用。解放后，韩国学界经过回归和反复，重新回到上述叙述方式。

<sup>6</sup> 许善道，《壬辰倭乱论——全新的正确认识》，《千宽宇先生还历纪念韩国史学论丛》，正音文化社，1985年。

崔永禧，《重新审视壬辰倭乱》，《国史馆论丛》第30辑，1991年。

崔永禧，《壬辰倭乱理解中的问题》，《韩国史论》第22辑，国史编纂委员会，1992年。

崔永禧，《对壬辰倭乱的几点意见》，《南冥学研究》第7辑，1998年。

有所提及，也只是描述为明朝面对丰臣秀吉提出的无理要求，为了弥合中日关系对其进行了册封，却丝毫没有反映日本的要求，最终这一欺骗行径导致了失败。讲和交涉既可以有效地说明战争始末，也可以进一步解读东亚三国的势力版图，但是它并未被赋予这样的机会。

讲和交涉为何被忽视？首先，日本对外扩张时期的研究把讲和交涉被视为一种耻辱。这一时期的研究认为，丰臣秀吉试图侵略中国的野心受挫，但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远征”的失败是讲和交涉者的欺骗造成的，因此讲和交涉也就完全丧失了研究价值。韩国解放后，学术界出现了“国难克服史”研究倾向，呼吁朝鲜王朝并非单方面战败，因此未能积极参战并妨碍复仇的讲和交涉必然带有负面形象。二战结束后，虽然日本国内的研究对战争持否定态度，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反思，但是依然回避了讲和交涉部分，几乎沿袭了以往的叙述方式。由此可知，解放后韩日两国都极力回避对讲和交涉的研究。两国人都难以接受与预期不符的战争观点，因此许多与讲和交涉相关的史料都被人们所忽略了。

另一方面，对于壬辰倭乱时期明朝与朝鲜关系这一问题，包括上述研究在内，大部分研究都强调明朝参战的重要原因是为了防止战火蔓延到本土，意在将日军的侵略阻断在朝鲜半岛。基本叙述版图也体现为战争期间明朝将本国意愿强加给朝鲜，朝鲜因此受害并试图抵抗。<sup>7</sup>

东亚历史教科书中的“壬辰、丁酉战争”和“丁卯、丙子战争”就是韩国历史教学与研究中所说的“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之所以采用不同的名称，是因为通过战争学习的目标内容不同。由于东亚历史将“减少矛盾、追求和平”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因此希望学生在学习“壬辰、丁酉战争”和“丁卯、丙子战争”时能够联想到和平。此时，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战争的背景和爆发原因以及战争带来的伤害等就成了核心内容。但东亚历史《17世纪前后的东亚战争》这一章节却并未达到这一目标，关键原因就在于教育课程评价和教科书编纂标准不合理。评价和编纂标准要求学生学习战争产生的影响，而不是探讨战争原因。在战争的影响问题上，既强调战争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强调战争对文化的积极影响。随着课改的进行，政府决定开设新科目的态度反映得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想在前近代史部分强调东亚地区文化同源性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又想近现代史部分强调解决本地区现有矛盾，因此“东亚史”教育课程应运而生。所以今后重新修改教育课程时，“17世纪前后的东亚战争”的教学内容应该描述为“对于17世纪前后东亚地区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可以结合东亚国际关系和各国的政治、社会情况进行说明。”<sup>8</sup>

教材对朝鲜通信使的叙述中也体现出偏颇的一面。教材中叙述如下：“德川幕府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并学习先进文化，通过对马岛主向朝鲜提出了恢复邦交的请求”，“日本接受了朝鲜的先进文化，每当德川幕府将军换代时都请求朝鲜派遣使节，以保障其权威获得国际社会承认”，“通信使不仅仅是外交使节，同时还发挥了向日本传播朝鲜先进文化的作用”。教材仍旧将日本描述成需要一个朝鲜先进文化的国家，但这与17世纪日本开关以后发展迅速、实现了和平与稳定的叙述相互矛盾。这是否意味着，尽管日本已经通过荷兰等国家接受了西方文明、实现了大力发展，却依旧努力从朝鲜引进先进文化？“近代世界”中对日本的发展叙述如下：“日本中19世纪与西方列强达成妥协，大力推行近代化政策，最终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行列”。此处采用了“妥协”和“挤进”等表达方式来描述日本的近代发展。

总体来看，教材中前近代时期的日本是一个文化落后国，既是先进文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侵略者和掠夺者。这种认识可看作是近现代殖民地掠夺论的一种延续。受益者、侵略者、掠夺者的前近代日本形象虽然不无合理之处，但并不准确，而且由于教材出版和叙述制度等韩国内部错误引发的问题较多。如此看来，对日本形象的描述自然是有问题的。《国史》教材采取单向视角，未将日本视为一个关系主体，这无益于解决当前朝鲜半岛存在的各种难题

<sup>7</sup> 金敬泰，《壬辰战争时期讲和交涉研究》，高丽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sup>8</sup> 车美姬，《高中〈东亚史〉中〈17世纪前后的东亚战争〉分析》，《韩国史学报》第56期，2014年。

和建立理想的日韩关系。因此应该尊重史实，突破本国历史，立足于东亚宏观视角，从关系史层面来叙述日韩关系。换句话说，应该做成“关系历史学”，而非“划界历史学”。目前中日韩三国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教师和市民团体正在效仿西方的国际历史教材合作运动开展历史教材交流合作活动。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些活动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

### 三、对近代东亚的叙述

在韩国，高中国史教科书以及韩国近现代史教科书中都很少提及中国和日本近现代史。19世纪以后，中日韩三国历史相互交织，几乎无法只根据一个国家的情况来叙述本国历史，然而教科书却似乎并未考虑到这一历史现实。韩国签订《江华岛条约》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壬午兵变时请求清朝派遣援军，韩国近代史由此拉开了帷幕。但对于日本和清朝出于何种“缘由”参与到韩国现代史中，书中却并未多做解释，只是简单地罗列了中日两国对韩国历史现实的应对情况。书中提到了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并未解释日本为何要将韩国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对于中国满洲地区成为独立运动根据地，也没有解释为何能够在其他国家进行独立运动。历史书中只提到了日本的掠夺本性是实行殖民统治的原因，并通过殖民统治得以体现，只讲述了日本殖民统治以及韩国人民的反抗情况，似乎认为日本是一个强取豪夺的国家，对此不必过多了解。

在韩国现代史的叙述中，日本一直扮演着侵略者的角色，中国则是独立运动的根据地和支撑力量，而东亚历史则完全缺失，韩国近代史的叙述也别无二致。1945年后，中日韩（包括朝鲜）各国历史长期隔绝，时至今日，区域关系依然存在着断裂。而且美国深度介入东亚现实，相关叙述却极度缺乏，对韩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说明占据了大量篇幅。朝鲜战争是一场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战争，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世界史教学中均有提及，但韩国的历史书中却并未对各国的参战原因加以说明，对美国、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参战或介入原因惜字如金。近现代史不同于其他时期，需要结合中国和日本历史进行说明才能理清脉络。但是书中并没有这种问题意识，目前的历史教育中也不存在东亚这一观点。解读自身固然重要，但解读他人也可以成为回顾自身的依据。<sup>9</sup>

今后编写历史教材时应该加入对中日等东北亚周边国家的叙述，追求人类普世价值，朝着增进相互理解和互相合作的方向不断努力。

---

<sup>9</sup> 高英津，《韩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前近代日本》，《历史文化研究》第25辑，2006年。